

19 世纪俄国文学的存在主义之痛

19 世纪以来，俄国社会舆论一直依据文学和政论而非真实的历史来评判俄罗斯民族性格。有一种观点被广泛认同，即俄国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的典型性格。之所以如此，既有文学家们自我感觉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舆论层面的原因。文学有其自身的创作使命，这些使命与反映“真实”生活的需求并不一致。然而，这并不妨碍作家自以为是在刻画“真实”的生活。另一方面，俄国社会是构建在“俄国式西方”的文化传统之上的，因此它会通过其错觉和神话的棱镜来评判俄国的历史和民族性格。

19 世纪俄国文学要比文化阶层存在主义的自我确定之需求更为宽泛。伟大的文学是对创造的永恒呼唤之回应，但这并不妨碍文学表达知识阶层的存在主义关切。与其说文学反映了俄国人民的种种问题，不如说它反映的是知识阶层的种种问题，文学展示的并不是人民的自我认知，而是文化阶层意识自我的种种尝试。因此，不能将贵族文学视为反映时代特征的历史现实主义文学，因为它无法涵盖俄国生活和俄国历史的各个层面，诸如不同阶层的生活风习、东正教的传统、大国意识的发展以及对广袤的严酷空间的移民和开发等。

“俄罗斯民族的心理是透过贵族文学和贵族世界观的棱镜展现给整个读书界的。无论不忏悔的贵族，诸如布宁，还是忏悔的贵族，诸如巴枯宁和拉夫罗夫，全都同样与人民格格不入。不忏悔的贵族在西方寻找理想的乐土，忏悔的贵族则只探求自由的思想。不忏悔的贵族谈论亚细亚式的俄国民众，忏悔的贵族谈论亚细亚式的俄国君主制，还有一些人（如恰达耶夫）则谈论整个亚细亚式的俄罗斯国家体制，但所有这些人都不愿、也不能、更不敢去理解俄国的历史和俄罗斯精神。”（伊·卢·索罗涅维奇语）有必要对俄国文学进行一种特殊的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在社会心理学层面，文学既能给出受教育者的典型性格，同时也能塑造普通人的形象，但该形象却是受教育者臆想出来的。因此，不能依据俄国文学来探究时代的特点和俄罗斯民族性格。

俄国文学的主人公并不是真实的人物和关系之再现，而是困扰知识阶层的各种问题之映射。这种文学既不是自然主义的，也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存在主义的。如果说西方作家所反映的主要是他们的所见，那么俄国作家所描述的则为他们的所感。俄国文学反映作家的内心命运、其所处阶层的历史地位和境遇以及其阶层在民族历史与文化中的位置，然后才反映作家对那些沉默蒙昧的（别尔嘉耶夫的定义）的阶层之态度。这些沉默阶层的内心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俄国文学的未解之谜。破解这一“民族之谜”一直是整个俄国精神文化关心的问题，因此也成为文学的主题。

从知识阶层的存在主义关切的角度看，可以确定俄国文学的几个关键问题：

- 一、知识阶层获得并意识到其历史地位和处境；
- 二、人民的问题，知识分子接近人民和融入人民的问题，即尝试认识其历史过错，并寻找救赎之路；
- 三、尝试重建尘世家园，即与民族传统文化建立联系；
- 四、渴望追溯天国家园，寻找文化的基督教源头、绝对的精神原则、稳固的道德价值观以及对永恒问题的现实回答。

站在这些问题的高度，文学揭示了时代的主要精神悲剧，即虚假社会中各种邪灵（人世间的邪灵、这个时代的黑暗统治者）¹对俄国的侵袭，以及俄国在与世界各种新型之恶的斗争中所肩负的使命。

这就是俄国文学的主要幻想，其中包含了知识阶层的许多迷惑。但是，俄国经典文学能够挣脱知识阶层意识中的存在主义羁绊。俄国文学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正是在这一步中，它成为了一种伟大且无与伦比的文学，并因为这一步而成为了地道的俄国文学。临近20世纪，俄国精神文化才凭借经典文学发现了自身的病症，却无法做出全面的诊断并开出治病良方。俄国文学向精神现实突围，触碰了民族文化的宗教基础，可这种触碰却是小心翼翼的，结果却引发了文化“眩晕”，这种“眩晕”在20世纪初体现为宗教文艺复兴时期作家所特有的双重性和变易性。

俄国文学既有其天才的洞察和预言，又有常见的时代迷误。其洞

¹ 引自圣经(以弗所书六章12节)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察在于它能以欧洲文学所不具有的勇气去探索并前所未有地接近关于上帝、人和世界的基督教真理。俄国文学的主要迷误则源于作家们的存在主义处境，他们对人民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源头认识不足，不善于发现人民的独特美德，还将自身的缺陷归咎于人民。“伊万·索罗涅维奇痛斥俄国文学对俄罗斯的关照不够全面。谁若是决定通过俄国文学来了解俄国，并决定为此遍读所有那些被称为经典的作家，诚然，他的勤奋会得到回报，他将读到很多鼓舞人心的精彩篇章。但是，这位读者能对这个国家了解到什么呢？！他会了解到“多余人”“死魂灵”“当代英雄”“黑暗王国”，可是“活魂灵”在哪里呢？“不多余的人”又在哪里呢？是谁建设了这个伟大的国家？是谁在保卫它？是谁在为其祈祷？又是谁在为了信仰、沙皇、祖国而奉献自我呢？

不论这多么令人难过，我们从俄国文学中都无法了解东正教的俄国，无法了解它内心深处的祷告，它“为基督而活”的信仰，它的精神壮举、它的虔诚信徒。俄国文学并未因上帝赐予我们挚爱的祖国以仁慈和宽容而高唱赞歌。（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果戈理、列斯科夫和阿克萨科夫等人属于例外，但是他们的赞歌曲高和寡并非主流。）有多少篇幅被用来进行社会批判，有多少精力被投入到揭露弊端和剖析创伤，有多少怨恨和指责被倾泻到祖国身上。“你既强大，又弱小。”但更多的笔墨却用来描写“弱小”和“肮脏”。俄国文学因满纸怨言而犯下大错。“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仅这一个问题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文学塑造了俄国的“黑暗王国”形象，使其充斥着“杰尔日莫尔达们”¹，并在其中建造了“愚人城”。这样一个“落后的欧洲外省”只能用革命手段来实现欧洲化。只有当俄国大地远离我们之时，俄国的东正教之光才能被看见。这时我们不得不在彼岸回望和注视这片土地。什梅廖夫曾用普希金的一句话来告诫俄国侨民：“我们对拥有的不加珍惜，失去后才开始哭泣。”

首先是国内舆论，接着是国外舆论，都是依据俄国文学和政论来探讨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并认为自己的证据足够充分。因此，从文学和政论中解读出来的关于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一切都需要进行修正和

¹ 取自果戈理作品《钦差大臣》，指粗鲁的、盲目服从上级命令的警察。

反思。

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认为，现实中的农夫从来不会像高尔基笔下的人物那样说话，他们的话含糊不清，语无伦次，不时夹杂着“这个，那个”等语气词……农夫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与被他习惯性地视为世仇的地主老爷说话，他自然会支支吾吾，他干吗要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呢？托尔斯泰的伪平民语言也正由此而来。如果不是与地主老爷讲话，俄国农夫的语言就极为丰富生动，富有表现力，鲜活明快。这样的语言托尔斯泰是听不到的。他这位永远的聂赫留朵夫，总是试图拿点小钱对农民行善，殊不知这些钱不过是他从农民身上掠夺来的大钱中的九牛一毛。

除了相互误解之外，别无其他……托尔斯泰是一位最典型的俄国贵族作家。因此你们会看到，一旦脱离他所熟悉的、他感到亲切的贵族家庭，他作品中的一切都会带上一种诋毁色彩，商人和医生，律师和法官，工厂主和手艺人等等，这一切都带有某种嫌弃的漫画意味。甚至连那些贵族，他们背离了唯一体面的贵族生活方式，即经营庄园和参加战争，结果也变成了没有人需要的白痴（如科兹内舍夫）。托尔斯泰可以描绘庄园，因为那是贵族的庄园，他可以描绘战争，因为参与战争是贵族的事情，可是当他跳出这个圈子，他塑造出来的要么是卡列宁那样的讽刺形象，要么就是卡拉塔耶夫那样的荒唐人物……托尔斯泰自己也承认，他珍视和理解的仅仅是俄国贵族阶层的世界。但是，他还有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即这个世界之外的一切对他来说不是了无趣味，就是令人生厌。

这一悲剧性历史误解的实质就在于，俄国作家、俄国社会舆论以及后来的欧洲社会舆论，都未能充分准确地把握俄国文学关于俄罗斯民族性格和命运所表述的一切之内涵。俄国经典文学在帮助俄国知识阶层洞悉本民族精神内核方面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但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的路还十分漫长，因为在长达二百年的疏离中业已形成一道巨大的鸿沟。伟大文学的伟大成就就在于，她完成了面向东正教根源和民族根源的转向，唤醒了社会的宗教良知，揭露了社会的诸多谬误和恶习，揭示了生活的本质矛盾，首次指出了那些席卷基督教世界的诸多精神疾病之致命危害。